

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

虞云国

智者沈公

陈昕



沈昌文漫画像 沈帆绘

社同戴文葆、史枚等一起具体草拟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规划，二十多年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又提出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沈公搞出版也是从翻译读物入手，而且一辈子乐此不疲。陈原先生著作等身，一部《社会学》被学界推崇为经世名作；沈公退休后也笔耕不辍，钟情翰墨，不时有新作问世；陈原先生的文章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沈公作文也是妙笔生花，亦庄亦谐。陈原先生思想解放，敢为人先，但在编辑把关上注重方法，讲究圆通；沈公在编辑工作中也是既思想开放又善于拐弯。如此对比，还可以列举更多。

作为智者，沈公在主持《读书》这本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风向标杂志时的所作所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案例。当年《读书》的作者队伍就是一个五线谱，杂糅，老中青，都乐于为《读书》撰稿，每一期的组稿谋篇如同走钢丝，找平衡，需上下逢源，左右开弓；既要敢为人先，思想解放，学术开放，又要坚守底线，不改弦易辙；对历史事件，既要反思，又不能背叛……许多问题的尺度不好把握，但沈公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每一期的《编后絮语》中，我读出了沈公的人生感悟，当编辑要有自知、自制、自嘲、自怜的涵养，遭逢鲜花掌声时，不必太昂首挺胸，遇到风浪时，要学会曲身于身去应对。沈公正是以他的智慧与艺术将这份杂志驾驭得恰到好处。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当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虽不时提醒甚至批评《读书》，却又将自己的作品投给《读书》发表，以示对刊物风格的认同。

沈公早年在上海银楼当过学徒，练就一副精明的商业眼光，对于30万资本金起家的三联书店的发展担起了创业的使命。他实行书刊互动，最大限度地运用《读书》杂志的虹吸功能，团结了一大批身手不凡的著译者，一步步将《读书》杂志打开的各类话题做大、做实、做透。他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作，征集热评的西方经典力作，推出“现代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他最先与台湾出版界接触，出版了不少台湾作家的图书，其中有漫画家蔡志忠的《菜根谭》在内的近四十本漫画书。这些图书都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为三联书店掘起第一桶金。他还抓住机遇，从国家计委批到八千万元资金，弄到北京市中心美术馆东边一块热门的地皮，这才有了后来的三联大楼和三联韬奋书店。

与陈原先生老革命、大学者的经历相比，沈公自学成才的学徒背景，要在当年文化名人扎堆的出版界主持大名鼎鼎的三联书店自然会引来一些看法和议论。沈公对此心知肚明，刻意放低身段，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能之人”，只是在遵循和执行出版前辈的意见，他在言谈举止上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油膩、俏皮的一面，以表明自己还是“下里巴人”。编辑圈里流传着许多“沈公轶事”，诸如“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坐以待毙”的编辑门道。其实，不能完全照字面来理解沈公的真意。“吃吃喝喝”讲的是编辑要在饭桌上将组稿事务搞定，回到办公室就能签约；“拉拉扯扯”讲的是编辑要有粘功，对有能耐的著译者要缠住不放；“谈情说爱”讲的是编辑与著译者要建立感情，不能有功利之心，这样才能建立长久的友谊，著译者才会将自己最好的书稿交你出版；“贪污盗窃”不是指钱权，而是指知识、学问，是要在与著译者的交往中学习，成为半个学问家，而且敢于在下一个著译者那里贩卖；“坐以待毙”是一种境界，那里是家里就能组到好的书稿，编辑出市场热销的图书，既为出版社创大利，也为个人赚个好光景。对于这类经验，正襟危坐者或许会斥为庸俗，但沈公的众多中青年粉丝却直呼精辟，更有明眼人指出沈公“游戏”言行的背后恰恰藏着他对出版的神圣、执著与纯粹之心。对于经历太多风雨和复杂人事纠葛的沈公来说，这份油膩或许是他精心涂抹上的一层人生保护层。

这就是我眼中的智者沈公。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流光容易把人抛”，这句宋词在感叹人生易老时，也道出了一个更深的哲理：岁月如潮，将冲刷去难以计数的个人印迹，哪怕他曾是名人。说起靳文翰，现今的史学新俊想必已知者寥寥。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1979年曾选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首届会长，也是同年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靳文翰是流金师的好友，但数年前抽编《程应镳先生编年事辑》时，却未能获知他的更多资料，甚至不能推断他们何时订交的。

去年岁杪，程怡世姐让我看一叠他的墨迹，说是拾掇杂物发现的。靳文翰书法娟秀，沪上《书法》杂志曾刊过他的作品。当年程家客厅就挂着他的条幅，写的是李贺《南园》绝句前两首。这叠书迹里，一类是平时练笔的，一类是准备赠人的。前一类中，有六十四张小斗方逐一誊录了全部《霜红词》八十四首，落款自注“癸亥九月初一晷”，时为1983年，可见他对胡士莹词的青睐。后一类书迹，都钤有闲章或姓名章，有一大斗方书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剑器舞》，连次序在内，整幅满满当当，但疏落有致，布局得当。另两幅自书同一旧作《浣溪沙》，一幅是书赠流金师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笃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附有教授名录，对靳文翰介绍颇略，说他生于1913年，河南开封人，1937年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肄业，1943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硕士。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与《吴宓书信集》，介绍靳文翰时有所补正，一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35年毕业”，二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三是从加拿大“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后，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仅此，他的履历主干略具，可据为年代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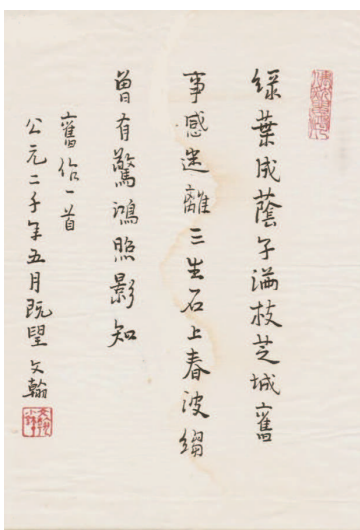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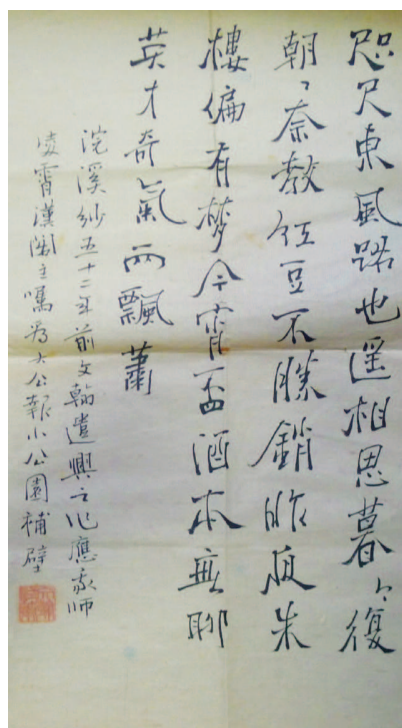
靳文翰手迹上或钤“汴梁靳氏”，籍贯无疑。其父靳志，字仲云，光绪丁酉（1893）拔贡，留学英法，民国时数任外交职务，还做过河南省政府代秘书长；鼎革以后，曾为河南省文史馆馆员。乃父既擅书法，兼工诗词，靳文翰自幼耳濡目染，也为终生之好。

靳文翰题赠流金师条幅，颇有破损，幸有同一词作的一手迹保存完整，比照原文如下：
咫尺东风路也遥，相思暮暮复朝朝。春教红豆不胜销，昨夜朱来楼偏有梦，今宵杯酒本无聊。英才奇气两飘萧。（《浣溪沙》）
五十二年前遣兴之作，应我师凌霄阁主人稿为《大公报·小公园》补空。金粟旧事，鸿【雪】因缘，偶忆及之，都成平生花絮。壬戌端午奉书应镳兄嫂病中一粟。文翰。

这幅未题赠款的跋语也说：“五十二年前文翰遣兴之作，应我师凌霄阁主稿为《大公报·小公园》补空。”足证这两幅书迹都写于壬午，即1982年。“应镳兄嫂病中”云云，与拙编《事辑》所载吻合，此不赘述。五十二年前是1930年，那年他才十八岁。据北京百衲2016年秋拍图册，有一幅他抄录《高阳台》词的墨迹，落款“公元二千年既望”，也有一段跋语：

三十年代初，余复东吴大学，师事凌霄阁主人，为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撰稿，结识沪上复旦大学就读蜀人笔友胡静屏先生，喜其于《紫罗兰》杂志上《高阳台》一阙，迄今已七十载矣，犹能省记。故重书之，以志鸿爪雪泥之迹云尔。

他说的“师事凌霄阁主人”，即曾任《大公报》副主编的民国名记者与作家徐凌霄，原名仁锦，笔名常用彬彬、凌霄阁主人等。从曷其《小公园》撰稿，徐凌霄显然很赏识靳文翰的文笔，有心人若网搜1930年代《大公报》，有望发现他更多的“补空”之作。靳文翰毕业于清华政治学系，按学制入学应在1931年。而他自述三十年代初“复东吴大学”，则十八岁时已入东吴大学，而后转清华的。他写《浣溪沙》时，应是大一学生。既自称“遣兴”，显



左图、上图：靳文翰手迹
下图：考取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学生在俄国皇后号上的留影



非拟古之作，排遣的应是无疾而终的相思寂寥，词作先极尽晏小山式的感伤缠绵，终出之龚定庵式的超拔英迈，亦足见其才情卓犖。

1936年5月，靳文翰在清华研究院做研究生，将其父《周易斋集》奉呈吴宓，吴宓曾复信说：“顷将赠赠尊翁仲云先生《周易斋诗集》十余卷，披阅一过，数日事毕；沉博绝丽，感慨凄凉，钦佩莫名。”作为报谢，吴宓托他转交《吴宓诗集》，“敬求仲云先生切实指教”；还殷殷寄语：“足下如有作见示，尤欣盼。读《周易斋集》，知贤郎亦早能诗也。”（《吴宓书信集》202—203页）吴宓从靳志诗里获悉靳文翰“早能诗”，印证了乃父对其诗才的熏陶。其后，他与吴宓仍有交往，据同年8月21日《吴宓日记》，“靳文翰伴农家瑛来，借去宓之Class. Lit.大纲”。农家瑛是外文系二年级女生，或许她要借《古典文学大纲》，靳文翰以结识吴宓之故主动伴她来访的。据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也在这年，作为学长，靳文翰对其“大谈基本功的重要”，自称“把奥本海默（Oppenheim）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已经读了八遍”，也见其用功的一面。

孔夫子旧书网上还有一幅靳文翰自书旧作的墨迹，落款也是“公元二千年五月既望”，诗云：
绿叶成荫子满枝，
芝城旧事感迷离。
三生石上春波皱，
曾有惊鸿照影知。

首句袭用杜牧《叹花》尾句，《叹花》原是寄托男女之情的，这首旧作显然也在追忆往日缱绻，罗曼史的上演地则是芝加哥（芝城）。当年惊鸿一瞥，也有过三生三世的盟誓，再见面时对方已有儿女了。“惊鸿照影”究是何人，“绿叶成荫”又为何年，俱已不知矣。

据钱伟长《怀念同窗益友郭永怀教授》，1939年，清华研究生共有八人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学生在俄国皇后号上的留影，前排左5）外，还有张龙翔（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曾任北大校长）、林家

翘（应用数学家与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郭永怀（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傅承义（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段学复（数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陈遵沂与靳文翰（照片后排左4）等。8月底，这批公费生从海防辗转香港准备海道赴英，恰逢欧战爆发，英国拒收外国留学生，只得再返昆明。据是年8月27日《顾颉刚日记》说，“遇靳文翰夫妇”，应是其首途前几天，可知他已结婚。流金师在1938年至1940年间就读西南联大，其时双方或已交往。历经周折，直到次年8月，这批公费生才从上海启碇转赴加拿大留学。网上还有他们在俄国皇后号上的留影，靳文翰也在其中。他在1943年获得法学硕士，回国已是1947年，“芝城旧事”也许就发生在这一期间。

靳文翰回国后，先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但旋即南下，任教于院址在上海昆山花园附近的东吴大学法学院（陈忠诚《东吴岁月》收有该院1947年毕业生与教师合影，他在现场）；大卸鼎革前后，他移居圣约翰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据流金师《丙申日记》1956年7月25日记事，上海史学界座谈“百家争鸣”，“田（汝康）、靳（文翰）二君谈北京讨论教学大纲情况”，于具体背景却语焉不详。据《顾颉刚日记》，同月9日及其“参加高教部之历史系教学大纲会议”事，会议全称“高教部审订文史教学大纲会议”；15日在北京饭店举行总结会议，周扬莅会讲话；会上文史分科审议，还各按专业方向分组，顾颉刚即分在中国史的“先秦两汉史组”。《顾颉刚日记》10日记其所见到的文史两界与会者名单，史学界有周谷城、陈守实、胡厚宣、耿淡如、田汝康、靳文翰、王楫、韩儒林、杨向奎、童书业、郑鹤声、殷孟伦、王仲荦、韩振华、丁则良、刘节、朱杰勤、梁方仲、徐中舒、缪钺、蒙文通、纳忠、李埏、郑天挺、杨志玖、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杨人鞭、皮名铨、张政烺、谭其骧、汪钱、田余庆、王崇武、傅乐焕、冯

家升、张芝联、翁伯赞、陈述，一时冠盖京华，名家云集。由此也见靳文翰当年人望。

改革开放后，靳文翰领衔与郭圣铭、孙道天主编了《世界历史词典》（1985年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编纂的首部大型世界史辞典，也是其主要成果。但改革开放前，却未见他发表过专著与论文，而同批庚款留学的六位清华理工科同学回国以后大都成果卓著，两者反差明显。不过，当年像他这样有意“述而不作”的人文学者，在高校并非孤例，在上海师院历史系，曾师从金岳霖的徐孝通与从学雷海宗的朱延辉也都如此。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当年，靳文翰把这叠书迹夹在围棋赛名单里交给程怡。这场棋赛是1983年3月27日日本围棋队访沪友谊赛，名誉棋圣藤泽保是日方团长，副团长为武宫正树，上海队棋手有华以刚、钱宇平、芮乃伟等。这张故纸凸现出靳文翰的另一嗜好。承蒙棋史学者杨柏伟兄提供靳氏另一墨迹，是书赠画家兼棋迷赵坚的，落款仍是“公元二千年五月既望”，与引自他自书缱绻旧诗与笔友小词都挥毫于同日。他在条幅里重录了1960年代“为王志贤师所著《四国围棋》一书的题词”：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山高水深，一枰之间。
乃执此以问道也，遂与公结师友之缘。

题词正文是四言诗，落款补叙了靳文翰的棋艺观与师友缘。在应老友赵坚之嘱重书这段题词与落款时，他新加了跋语，交代此书终以大环境之故，“未能付诸梨枣，曷胜感叹，手抄一册，犹置案头存念，然已三十余载矣”。短短的题跋饱含着对围棋的痴迷，对师友棋缘的珍惜。另据朱伟的《靳文翰家》（载《上海围棋棋事》，上海文化出版社），靳文翰年轻时从丁渠清棋，1949年前拜老棋手王志贤为师。即便在那特殊年代里，每逢周日，卡德公寓靳家客厅几乎成为“星期棋会”，不仅赵之华、章原、尤伟亮、陈华钦、邱玉瑞、柳曾符等围棋名家前来手谈，其他棋友也不请自来捉对厮杀，往往四五枰棋同时摆开。闲杂人等竟引起了居委会注意，他只得收缩范围，仅接待熟悉的棋友。1985年，靳文翰与夫人移居美国，夫人乐不思蜀，他却于1987年夏天只身回国。据流金师《复出日记》，这年7月28日，他自美国回国不久即来访叙旧。说起回国缘由，答曰美国没有围棋玩伴。

靳文翰在晚年书迹上常钤两方闲章，一方是“东西南北客”，一方是“偶然留鸿爪”（他尤其钟情于后一印文，有一枚长方形，另一枚椭圆形）。前者或典出陈与义诗“轮中老子无远策，长作东西南北客”；而自称“东西南北客”，主旨并非自诩一生行脚，也非自叹居处不定，或是老来有感于时运不济而未展抱负（所谓“远策”）。后者显然出自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自题“偶然留鸿爪”，应是参透了个体生命面对宇宙洪荒竟那么瞬间与渺小，此生行迹不过雪泥鸿爪，自己即将飞过，何必再去计较什么得失！这两方印文，或许蕴藏着靳文翰暮年的感慨与彻悟吧。

筆會



春水（绢本设色）向世奎